

# 东南亚历史学刊

4

中山大学  
东南亚历史研究所

1987, 12

东南亚历史学刊

第四期

1987年12月

主编

许肇琳

副主编

罗汝材

编委

黄重言

马宁

汪新生

段立生

目 录

东盟研究

- \* 1987年香港“东盟与中国关系”国际会议纪要……温广益(1)
- \* 东盟的建立与发展……………李惠良、刘迪辉(9)
- \* 东盟二十年浅析……………马宁(16)

华侨华人问题

- \* 建国初期广东侨汇浅析……………冯元(21)
- \* 1910~1941年泰国对华贸易与汕头港……………罗晓京(30)
- \* 略述1786~1826年英殖民当局在槟榔屿  
及新加坡的华侨政策……………陆宇生(48)
- \* 试论星马华团的发展及其影响……………周益群(58)

菲律宾史研究

- \* 略论菲律宾人民反西起义的几个特点……………金雨雁(66)
- \* 评阿吉纳尔多与博尼法西斯奥之争……………刘迪辉(73)

中外关系史

- \* 元代的中缅关系……………余定邦(81)
- \* 宋代南海航线的溲洲  
——兼论《萍洲可谈》……………林家劲(92)

译文

- \* 泰语族的故乡……………〔泰〕巴色·纳那空撰 王伟民译(96)
- \* 海瑞在东南亚……………〔德〕傅吾康撰 马宁译(107)

人物志

- \* 一位身兼三国外交官的中国人——胡亚基……………罗汝材(110)

学术交流

- \*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今年来接待多位外国学者  
……………汪新生(111)
- \* 泰国法政大学里奇教授应邀来所讲学……………陈树森(112)
- \* 两次世界大战间亚洲之海外华人国际研讨会  
会在香港举行……………张映秋(115)

# CONTENTS

- 1、A Summary of "China—ASEAN Hong Kong Forum 1987" .....Wen Guangyi
- 2、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ASEAN .....Li Hui liang  
Liu Dihui
- 3、An Analysis of Twenty Years of ASEAN .....Ma Ning
- 4、An Analysis of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to Guang Do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PRC .....Feng yuan
- 5、The Trade of Thailand with China through Swatow port, 1910—1941 .....Luo Xiaojing
- 6、An Account of the British Policy to Overseas Chinese in Penang and Singapore, 1786—1826 .....Lu Yusheng
- 7、On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Society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Zhou Yiqun
- 8、An Accou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ilippino Anti—Spanish Revolt .....Jin Yuyan
- 9、A Comment on the Struggle Between Agujnaldo and Bonifasio .....Liu Dihui
- 10、Sino—Burma Relation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Yu Dingbang
- 11、Ruzhou on the South Sea's Route During Song Dynasty (On the Ping Zhou Ke Tan) .....Lin Jiajin
- 12、The Home of Thai Peoples .....Prasert Nanakern  
(Thailand)  
Translated by Wang Weimin
- 13、Hai Jui in Southeast Asian .....Wolfgang Frank  
(Germany)Traslated by Ma Ning
- 14、A Chinese who Assumed Simultaneously the Diplomatic Officer of Three Countries .....Luo Rucai
- 15、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by Our Institute Before September this Year .....Wang Xincheng
- 16、Prof. Likhit of Thailand Thamasat University Given a Lecture in Our Institute .....Chen ShuShen
- 17、"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ASIA)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had been held in Hong Kong .....Zhang Yingqiu

# 1987年香港“东盟与中国关系” 国际研讨会纪要

温广益

## 〈一〉

1987年6月3日至5日,在香港举行了“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会议由香港岭南学院亚太研究中心<sup>①</sup>发起并主持。这次会议得到纽约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纽约福特基金会和日本东西方讨论会拨款赞助,并各自派出项目负责人参加研讨会。与会学者共四十余人,其中来自美国六人,日本二人,南朝鲜二人,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各二人,新加坡三人,香港九人,台湾二人,中国十人。东盟的新成员国文莱没有派学者参加。

研讨会主题为“变化中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关系:局限与机遇”;具体内容分为五个方面:一、东盟与中国在全球(主要是亚太地区)和地区(指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二、中国和东盟国内的最近发展;三、亚太地区的中国与东盟:现实的与概念上的;四、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现实的与概念上的;五、中国的现代化对东盟国家是挑战还是机遇。召开这次研讨会的目的,诚如东道主所指出的,共有四个方面:一、增进中国、香港及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二、促进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学术研究;三、建立中国、香港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学术联系;四、研究近年来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

参加研讨会的论文共二十篇,其中中国学者十篇,外国学者十篇。东道主和日本、南朝鲜、台湾等地学者未提供论文,他们主要以评论员身份参加研讨会。

中国学者及其所撰论文题目如下:

- 1、金德湘(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最近国内的发展”。
- 2、陈毕凡(北京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格局的变化”。
- 3、章嘉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大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和竞争:对东盟国家的影响”。
- 4、季国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研究室主任):“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方面的作用”。
- 5、廖少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所长):“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 6、温广益(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正常化”。

<sup>①</sup> 该中心成立于1986年10月,是得到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理事会的拨款资助而成立的。

展望”。

7 陈乔之（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香港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方面的地位与作用”。

8、杜敦信（广西社科院印支研究所副所长）：“如何增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

9、周中坚（广西社科院印支研究所副所长）：“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

10、金旭东（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助研）：“中越关系及其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

外国学者及其所撰论文题目如下：

1、戴维·温德福特（David Winterford，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教授）：“苏联海军在东南亚的集结：对中国和东盟防卫的牵动”。

2、谢尔登·W·西蒙（Shelton W. Simon，美国阿利桑纳州立大学政治学系、亚洲研究中心）：“八十年代的东盟战略地位”。

3、尤素夫·瓦南迪（Jusuf Wanandi，印尼专业集团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部主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地位与作用”。

4、张保民（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高级讲师）：“中国与东南亚：看法上的差距”。

5、约翰·王（John Woug，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副教授）：“中国和发展中的亚太经济”。

6、S·詹德拉·塔斯（S. Chandra Das，新加坡国会议员、商人）：“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在东盟的地位和作用”。

7、诺莱妮·哈齐·阿卜杜拉（Noraini Haji Abdullah，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东盟国家：本国的政治倾向和挑战”。

8、奥马尔·克鲁斯（Omar Cruz，马尼拉研究与信息中心、战略部负责人）：“菲律宾本国的发展”。

9、爱德瓦尔多·C·塔登（Eduardo C. Tadem，菲律宾大学发展研究助理教授、菲律宾大学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

10、蒲瓦多·孙巴塞（Phuwadol Songprasert，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蓝甘亨大学历史系讲师）“中国的现代化：泰国华人资本的好机遇”。

## 〈二〉

会上有16位学者先后宣读了各自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然后由与会学者进行评论和研讨。

研讨会上讨论了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着重讨论了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及探讨未来的关系。

研讨会对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热烈讨论，有以下几个因素促成：一、二

战后，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与东盟的某些国家，如新、马、菲、泰等国，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有的甚至到现在都还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与印尼虽然早于1950年5月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后来却于1967年10月中断了。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现在都感到需要加深相互了解。二、1979年以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几年来，开放、搞活和改革的内外政策对亚太地区、尤其是对东南亚近邻带来巨大影响，何况东南亚地区还聚居有约占世界海外华人、华侨90%的中国血统居民，因此引起各国政府和有关机构的重视，并对这一情况进行研究。三、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致力于与邻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改善关系。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引起某些东南亚国家（主要为新、马、印尼等）不必要的担忧，如担心中国强大后会不会又成为“过去的中国”，把东南亚视为中国的“藩属”或“朝贡国”。五、1979年我国对越南实行自卫反击以及庄严重申对西沙、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引起某些东南亚国家不必要的疑虑，以为中国又要在这一地区建立“中心王国”。

这里着重介绍东南亚国家某些学者对以下问题所提出的较具代表性的观点。

### 一、关于中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作用

印尼学者瓦南迪在其文章中指出，“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成员国之一，但中国在全球的作用仍将是有限的”；他认为“中国在全球的作用将大部分体现于亚太地区，而在这里中国碰到二个超级大国和日本”。他以为“未来的二十年，人们将看到中国将继续优先发展其经济现代化”，因此，“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国要促进与亚太地区国家的良好关系，而不甚强调社会制度的不同”。他指出，“中国与某些国家、其中包括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主要体现于贸易和其他经济领域”。他客观地指出，“鉴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上具有巨大的潜力，它在维持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可作出巨大的贡献”，并认为“中国将被视为国际家庭中的一个负责成员而大大地增强亚太地区的稳定性，而这也减少东南亚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感”。

### 二、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新加坡学者张保民在其文章中谈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时指出，“东南亚国家或多或少地把中国视作一种鼓舞和政治上合法性的来源，而中国也认为东南亚是其天然的势力范围。这种互相协调的观点具体体现于当今众所周知的朝贡体制里，在该体制下，东南亚国家自发自愿地对中国表示敬意和进献贡物，并把中国视作其宗主国，以换取中国在他们急需之际及时给予保护和援助”；而且，“在此阶段的早期，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彼此是稳定的和真诚的，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实际上对其朝贡国不偏不倚所致”。他还指出，这个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在经济上也进行自由的物质交流，虽然贸易数量不是很大，但彼此在产品 and 货物供应方面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进行竞争的。因此，中国的形象在东南亚是受尊敬的和慈祥宽厚的，而且中国不时的出现也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欢迎”。

但是，在谈到当前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时，张保民却认为“在东南亚国家的眼里，中国已明显地不再是鼓舞的源泉，远非他们发展的榜样了”；他甚至认为鉴于“中国的共产主义本质和侵略性的政策，必然是东南亚国家要小心地加以回避的头号国家”。他认为“中国虽然渴望与东南亚国家建立紧密的关系，然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良好意图却抱有不信任感。因此，尽管

有许多有利机会，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却仍然充满着陷阱。基本问题在于中国可能仍然在推行一些旧的设想和希望，而这些设想和希望已不再符合东南亚的实际情况”；因此，他的结论是，“中国在与东南亚打交道时，她所认为是其机遇或有利条件，但从东南亚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可能是她的局限或不利条件”。

瓦南迪在其文章中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可作二个方面的估计。第一个估计是，中国将一向被视作对东南亚的假想威胁。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鉴于过去的经验，中国认为东南亚是其势力范围所致。不过，他指出，“这个威胁概念要适当地看待，不要成为一种狂想，以妨碍与中国正常关系的发展”。因为，他认为“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她并未无限期地侵占过别的领域或国家”，但他却混淆是非，认为“一些边境地区，如内蒙、西藏和新疆是例外”。他指出，“至于别的地区，包括越南，中国曾派过远征军，但一旦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优势得到有关国家的确认，她便立即撤军”；他不分辨中越边境发生战争的性质，指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1979年与越南对抗时又重复发生，但这是不成功的，因为越南作好充分准备对付中国”。所以，他认为“这一插曲表明，来自中国的威胁应适当看待”。他估计，“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中国的军事能力似乎大部分出于自卫的性质，还不会对东南亚形成直接的威胁”。

第二个估计是，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落后于东盟国家。因为“鉴于中国面临许多问题，例如地广人多，经济基础不发达，高度的官僚机构和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要加速经济发展，并非易事”。不过，他认为“也需要注意到，由于劳动力低廉和经济管理高度集中，使中国在某些农业和制造业部门颇具竞争能力”；然而，“鉴于东盟国家的经济更富于活力和灵活性，人们可以期望中国与东盟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可互为补充，而不是互为竞争”。他指出，问题在于“当中国在二十年内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时，中国会不会再坚持其‘中心王国’的地位”，亦即中国将如何对东南亚施加影响？他认为“中国试图尽力对东南亚施加影响，但将不采用苏联的侵占或物质扩张的形式，而将采取类似过去的‘朝贡关系’的做法。这意味着中国将期望在这个地区的事务中承认她的作用，并按照她所认为的民族利益对东南亚施加影响”。

菲律宾学者塔登在其文章中指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确实是两种不同和对抗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彼此接触”，但他认为“东盟在发展其国民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可学习中国的独特经验”。他客观地指出，“所有东盟国家（可能新加坡例外）的经济都是不发达的和脆弱的，它以存在大量的贫困、低水平的工业化和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依赖西方国家和工业化的日本为其特征。即使是新加坡，由于缺乏坚实的国内工业基础，过分依赖对外贸易，已使其经济最近遭到严重的萎缩”。他还指出，“中国已成功地捍卫了其民族独立，增强了国家安全和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而把东盟远远抛在它的后面”；“中国已赢得国际家庭的尊重，它的人民能昂首屹立”。他的结论是，“由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已被证明不适合于第三世界、诸如东盟集团的需要，向其他制度不同的国家例如中国学习的必要性，就显得更为紧迫”。

泰国学者孙巴塞在其文章中认为，“总的来说，中国仍然在寻找各种途径增进与东盟的友好关系，因为这种成果不但有利于维护地区的稳定，而且有利于它的现代化计划。同时，中国

和东南亚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比过去任何时期为东盟成员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努力与这个巨邻分享共同的利益”。他强调，“在东盟国家中，泰国不但成功地于1975年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且尽管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泰国比这个地区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愿意和积极地促进与中国较为密切的联系”。他指出，“这个发展不但来源于两国人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有着友好关系的事实，还因为在与越南对抗中有着共同利益。因此，两国结合得更紧密了，而且，整个时期以来，尤其是中国决定改变其经济政策，对外开放以实现现代化以后，两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增强了相互合作。这个方向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并给两国带来巨大的机会，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发展两国的合作”。他还指出，“中国乘此时机改变其对海外华人的旧政策，使它更能吸引国外的同胞，参加他们祖先故地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因此，他认为，“这样的两国友好关系和在中国的其他有利气氛下，必然有利于泰国的本国资本，而这个资本主要是由华人企业家所控制的”。孙巴塞在其文章中列举了中国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泰国华人资本在中国投资举办联合企业的许多实例，同时客观地指出在发展联合企业方面中泰双方各自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障碍。最后，他得出结论：“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对海外华人政策的改变已给泰国的华人资本带来好处。同时，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促进联合企业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毫无疑问，泰国的华人企业家在中国开始其现代化计划方面是可以从中得到他们适当利益的。因此，泰国私人企业及其在中国的联合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已获得迅速发展。所以，泰国的私人企业应尽可能更勇敢地尝试从中国的开放经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因为这种活动对泰国的华人资本有利，而且对未来两国的经济将带来繁荣”。

### 三、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独特问题

印尼学者瓦南迪在其文章中指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五个独特的问题：

#### 1、领土争端

他指出，“某些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已宣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南沙和西沙群岛。这些带有冲突性的要求是公开冲突的潜在来源，因为这个地区可能藏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宣称拥有南沙群岛，而这些国家已派出军队驻扎于各个岛屿。……中国和越南还宣称拥有西沙群岛，而这个群岛的一部分已为中国武装力量所占领”。他还指出，“中国的官方地图仍然标明南中国海为中国的领域，虽然这个要求不是很明确的”，因此，他不恰当地指出，“这种含糊不清的态度已导致东南亚部分国家对中国在此地区的巨大不信任”。

#### 2、“华侨”问题

他在文章中提到，“1980年中国颁布了一部新的国籍法，第一次把中国公民和东南亚国家的华裔公民加以区别。它规定那些已经成为当地国家的公民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不应存在双重国籍问题。那些保留中国国籍的，即‘华侨’，则规劝他们遵守居住国的法令和条例”。但是，他指出，“在这个新国籍法里有一条文将会令人感到含糊不清。这一条文允许非中国籍的华裔返回中国，可自动再获得中国国籍”；他想当然地认为，“据说，这一条文意在允许老华人在中国去世”，所以，“从东南亚国家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条文将大大降低华裔公民对居住国家忠诚的可靠性，因为中国可以从中‘玩弄’条文”，因此，他希望中国政府能稍加或完全澄清这一问题。他还认为，“对中国意图的不信任感，由于中国政府号召非中国籍的华人大量参加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有所扩大”。



新加坡学者张保民持有与瓦南迪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政府与东南亚华人之间一度存在紧密的关系，因此中国政府任何对他们表示的热情，或任何争取他们人心的努力，都被视为对正在建设中的东南亚各国的不祥之兆，并且削弱他们国家安全的基础”；他煞有介事地指出，“只要提及华人对中国发展计划的可能贡献，都将引起当地政府的猜疑、甚至疏远中国”。他甚至认为，“由于东南亚绝大多数华人已成为当地的完全公民，中国常使用‘华侨’一词已引起所有东南亚政府的反感”。所以，他认为，“中国试图通过血缘和语言源流号召东南亚华人投资，将会不自觉地损害东南亚国家(的利益)，并给中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总之，他们对此问题的观点与泰国学者孙巴塞的看法大相径庭。

### 3、党与党的关系

瓦南迪在其文章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对东南亚的地方共产党已不再提供军事支持，即后勤和武器方面的支持，但对缅甸共产党是例外”；他指出，“中国强调，他们的支持主要是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至于(当地)共产党能否成功推翻他们的政府，应该主要依靠其本身的力量”。他指出，“中国当前抑制其党的关系的政策可能会继续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正专心致力于她的现代化，而这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否则将受到干扰”。他期望，“当中国已经实现其现代化时，将给予国与国和政府与政府的关系，比给予党与党的关系以更大的重视”。

菲律宾学者塔登在其文章中正确地指出，“当前东南亚共产党领导的叛乱活动，实际上是依靠自身力量的政治运动，它运用的是土生理论，它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以维持他们的活动”；他还指出，“如果缺乏本土条件，叛乱活动是很难发展的。当前，东盟国家的不发达和贫困是由于不加批判地应用西方的发达模式，因而为武装叛乱提供沃土，而不是由于外来的因素，诸如外国对叛乱活动的支持”。

### 4、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

瓦南迪认为，“东盟部分国家有些担心中国在轻工业、特别是在纺织、成衣以及各种矿产品方面，将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这种担心的增长是由于中国保持高度的整体化计划所致”。他认为东盟国家要解决此问题可有二个办法：“一、应当引导中国参加各种多国性的组织，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以便使中国或多或少地接受大多数国家遵循的国际准则；二、东盟国家应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以便打开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机会”。他指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竞争是很难避免的”，但是，他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可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其实，在过去的几年，人们已经看到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之间稳步增长的双边贸易”；他还指出，“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她在与工业化国家集团进行协调时可为发展中国家的好处境施加影响，而这对东盟国家也是有利的。更重要的是双方还有许多潜力，可以给未来互为补充的经济带来更大的发展”。

### 5、柬埔寨争端

瓦南迪认为，“对东盟国家来说，解决柬埔寨争端仍然是紧迫的，因为争端拖得越久，东盟内部就将越紧张”；但他不恰当地认为，“东盟国家的威胁概念与中国的因素有关”，并无端指责“中国继续在军事上支持红色高棉，实际上是对这个地区进行外部干涉的一种形式”，却避而不谈苏、越推行地区霸权主义造成印支局势动荡所应负的责任。他认为解决柬埔寨争端

“可能要依靠东盟国家把中国和越南带到谈判桌上来的能力”，并认为“东盟国家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可能会影响东南亚国家自身的未来关系以及他们与中国的未来关系”。

瓦南迪在其文章的结论部分对中国与东南亚的未来关系作三点估计：一、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未来关系并非只依赖于柬埔寨争端的结果。他认为，“东南亚国家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可建立在此之上，即主要大国在东南亚的出现应维持均势，而且对双方互利。换句话说，东南亚国家应对自身的能力抱有巨大信心，并引导东南亚国家与主要大国(包括中国)有着一个较为健康的关系”。二、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也有赖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因为“一个现代化和成功发展的中国，将使她成为国际家庭中更为负责的成员。为了保持发展的势头，中国将意识到开放政策与她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三、他不恰当地认为，“中国并非不可能推行其传统的野心，但中国可能很快觉察到这与她在现代世界中的新地位不协调，甚至如果中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东南亚国家很可能在未来作好充分的准备以面对事件的可能进程”。

### 〈三〉

研讨会上中国学者针对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学者提出的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地对以下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评论和阐释：

一、中国是否认为东南亚是其传统势力范围的问题。这个观点是由新加坡学者张保民(见本文第3页)和印尼学者瓦南迪(见本文第4页)所提出来的。中国学者认为，除了古代和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由于地理条件等的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尤其是与半岛国家如緬、泰、越等有较密切的政治交往关系以外，与海岛国家的关系是甚为松散的。至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东南亚国家(泰国除外)已先后逐步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中国本身也已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根本就谈不上把东南亚视作其“天然的势力范围”的事实。

二、中国是否为东南亚国家的“长远威胁”问题。这个观点也是由印尼学者瓦南迪以及新加坡学者张保民所提出来的。张保民在其文章中强烈地指出，“即使有一天中国在未必可能的情况下放弃共产主义，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和强大的中国仍将对东南亚构成真正的政治威胁和主要的经济挑战者”。中国学者指出，1979年中越发生的边境战争，是越南较长时间以来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所蓄意挑起的，中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自卫还击的；西沙与南沙群岛在历史上早已明确属于中国政府所管辖，中国施政于西沙群岛是属于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范围。因此，以上两件事情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为捍卫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与中国要在东南亚重建“中心王国”完全是两码事。至于一个国家的人民选择共产主义制度和推行现代化的方针，则纯属一国的内政。客观的现实是，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出现只能对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因此，这种指责是超出学术研讨范围，是不够郑重的表现。

三、关于“中国并未无限期地侵占过别的领域或国家，除了一些边境地区，如内蒙、西藏和新疆是例外”的问题。中国学者严肃地指出，把内蒙、西藏和新疆排除在中国领土之外来考察问题，这并非学术观点问题，而是起码的政治原则问题。瓦南迪在其文章中虽未正式点出内蒙、西藏和新疆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但从上下行文来看，作者的意图和观点是明确的。汉民族与蒙古、西藏、新疆民族之间在历史上发生齟齬，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事情，就象东南亚

一些国家也经常发生民族纠纷一样。因此，不能把一国在历史上发生过某些民族纠纷事件，与侵占过别的领域或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

四、关于中国有无以武器支持缅共的问题。这是印尼学者瓦南迪在其文章中所提出的（见本文第6页）。中国学者指出，就我们所知，中国政府出于革命人道主义，对缅共伤病员曾提供过医药上的某种帮助，但早已不存在武器方面的支持。因此，不知作者从哪方面获得此有关资料的。瓦南迪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解释，“我的有关中国方面的知识是来自第三手资料”。

五、关于中国政府颁布的新国籍法的某些条文是否会引起华裔公民不忠于当地政府的问题。这也是印尼学者瓦南迪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见本文第5页）。中国学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第十三条是这么规定的：“曾有过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具有正当理由，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这里条文作了两则明确规定，一是“曾有过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即过去的华侨；二是需“具有正当理由”，符合此两条的华人才“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否则不能。因此，这一条文不存在“意在允许老华人在中国去世”，也不存在鼓励华裔公民再脱离当地国籍而恢复中国国籍，即使有华人因某种原因申请恢复中国国籍，也将是极个别的，已不可能再构成大量的社会现象。因此，这样的条文不致引起“大大降低华裔公民对居住国家忠诚的可靠性”。

六、关于中国是否试图通过血缘和语言源流号召东南亚华人投资，以及这种做法会不会损害东南亚国家的利益的问题。这个观点主要是新加坡学者张保民提出的（见本文第6页）。中国学者认为，首先我们应充分地认识到战后东南亚华侨已绝大部分参加了当地国籍，成为当地公民，因此，昔日的华侨资本已变成当地民族资本的组成部分，即华人资本这一事实。其次，华人资本获得较大的发展，在发展当地民族经济方面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近十年来无可否认的另一事实。现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欢迎外国资本（其中包括华人资本）来华投资，这会不会损害有关国家的利益呢？其实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少国家的华人资本早已跨越本国的界限，它们不但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在港台等地投资，或搞联合企业。他们这样做，没有人指责会损害其本国利益，为何来华投资就会损害其本国的利益呢？其实，作为资本，一是追求利润，二是要求周转快，三是要求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其中包括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因此，哪里有利，它就会流向哪里，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中国不具备或缺乏上述三方面的条件，即使想“通过血缘和语言源流”号召华人投资，也往往难于实现。

中国学者还对其他一些较次要的问题进行阐释，在此不一一介绍。

#### 〈四〉

这是第一次以“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与会学者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讨论的多为当前较为敏感的某些问题，加之他们掌握的资料和立场观点等各异，因此，彼此之间对历史上特别是对当前以及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以至引起某些争论，这在学术研讨会上是常有之事。由于与会学者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

（下转65页）

# 东盟的建立与发展

李惠良 刘迪辉

## 〈一〉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是一个区域性组织,成立于1967年8月,由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组成,通称“东盟五国”。1984年1月1日,文莱获得独立。同年1月7日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成为第六个成员国。

东南亚国家联盟不是东南亚国家第一个区域性组织,在它之前,东南亚地区存在过“东南亚联盟”(ASA)和“马菲印联盟”(Maphilindo)两个组织。前者成立于1961年7月,由马来亚、菲律宾、泰国组成。该联盟是东南亚没有帝国主义势力参加的第一个区域性组织,其目的在于促进三国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东南亚联盟”从建立至1963年4月近两年间召开了十四次会议,其中有三次外长会议<sup>①</sup>。但是会议提出和商议的方案,多属纸上谈兵。而且由于菲律宾在1962年6月提出对沙巴领土主权的要求<sup>②</sup>,马菲关系恶化,1963年菲律宾退出“联盟”,从而导致“联盟”徒有其名。为了摆脱僵局,求大同而存小异,1963年7月20日至8月5日,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三国首脑在马尼拉会晤。根据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的倡议,达成了成立“马菲印联盟”的协定,酝酿建立一个马来国家联盟,以便在经济、文化和国防方面进行合作。但是不久,即同年8月,马来西亚正式成立,却使盟国反目成仇。菲律宾拒绝承认马来西亚,并召回驻马大使。马来西亚也召回驻菲大使。菲马关系破裂。印度尼西亚也拒绝承认马来西亚,并采取了对抗马来西亚的政策,(1963—1965年)。这样,“马菲印联盟”尚未登台亮相便夭折了。

显然,早期的两个区域性联盟的瓦解和夭折,表明东南亚地区的区域性合作不过是镜花水月,尚不成气候。其主要原因在于:尚不具备一种强大动力,足以冲破这些国家之间的包括领土争端、民族冲突、宗教偏见在内的严重阻碍。但是,早期建立联盟的尝试,仍有着一定积极的意义。它无疑为日后在新的条件下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留下弥足珍贵的经验。

六十年代下半期,东南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促成东南亚国家走向联盟。

1967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要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证明帝国主义在亚洲地位的削弱。六十年代中,美国进一步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从1965年起,美国直接介入了反对越南南方人民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南打北炸”的政策却屡遭重挫。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援。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要求停战的呼声日高。这一切预示着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战争前景暗淡。

事实已经或正在证明,亲帝国主义的军事同盟和集团已非万无一失的保护伞。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帝国主义同盟者来保证它们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况且,在世界经济危机

中，发达国家总是以各种手段，如压低原料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将危机的损失转嫁给发展中的国家、使它们受害不浅。

鉴于上述原因，六十年代后半期东南亚国家企图寻找新的途径来捍卫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就促进它们靠拢，联合起来，通过区域合作来稳定局势，促进国家的经济繁荣。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共同决定自己的命运，共同防止外来干涉，乃是他们国家生存的唯一途径<sup>③</sup>。

于是，原来关系紧张的几个国家开始修复他们的关系。1965年10月和11月，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就任总统。这两位国家首脑采取了调整同马来西亚关系的政策。1966年，苏哈托实行国内外政策的“新秩序”，放弃了对抗马来西亚的政策。接着，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也逐渐缓和改善，菲律宾政府宣布在保留将来对沙巴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权利的同时承认马来西亚。1966年6月，菲律宾同马来西亚恢复了两国正常关系。菲律宾又回到了“东南亚联盟”组织之中。马、菲、印三国关系的改善，为建立新的东南亚区域组织创造了前提。

1967年8月5—9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8日，发表了曼谷宣言，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接着，8月28—29日，“东南亚联盟”在吉隆坡举行第四届部长会议，同意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代替“东南亚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常务委员会接管东南亚联盟秘书处的的工作，东南亚联盟宣告解散。

《曼谷宣言》称：“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宗旨和目标是“加速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繁荣、和平的东南亚国家的共同体”<sup>④</sup>。

综上所述，“东盟”是当时东南亚形势发展的产物，它的成立反映了东南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共同愿望。

## 〈二〉

“东盟”成立至今，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67年至1975年。在这九年间，真正的区域性合作进展比较缓慢，其原因之一是联盟内部关系还不太融洽，因为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对抗刚刚结束，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关于沙巴的领土争端尚未解决。1968年9月18日，菲律宾国会通过了《沙巴合并法令》(Sabah Annexation Act)<sup>⑤</sup>，宣布沙巴为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这导致1968年11月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外交关系再度紧张，两国几乎大动干戈；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不久(1965年)、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相当突出；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边界纠纷也时起时伏。因此，东盟国家还难以克服民族主义的障碍，开展广泛的、实质性的区域合作。最初几年，东盟的合作，可说还处在一个酝酿和探索阶段。但这是有成效有建树的探索，它在下列两个方面为东盟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首先是完善东盟的组织机构，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东盟”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外长会议，东盟的职权由各种特设和永久的委员会行使，最后对外长年会负责。直到1975年在雅加达建立了“东盟”的中央办事机构——“东盟

秘书处”，才最终建立了通过定期协商求得五个成员国意见一致的体制。在设立和完善东盟组织机构的同时，东盟各国的领导人通过频繁的接触，促进了相互谅解和必要的信任。这对东盟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东盟各国在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文化特性等诸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倘若没有互相间的了解和信任，很难想象能够妥善地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或潜伏的矛盾和冲突。

在第一阶段，东盟的另一令人瞩目的成效是关于东南亚“中立化”的主张。东盟的这一主张是应付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对策。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新的格局正在形成，大国都在调整对外关系。

英国宣布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其结果之一是1971年底英军须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撤出；与此同时，美国为了加强它在欧洲和中东同苏联的争夺，被迫收缩它在亚洲的力量。1969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的讲话，提出了一项美国关于亚洲政策的“指导方针”。这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新政策，表明美国决心继续在亚太地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但为了收缩力量，将采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新亚洲政策”。尼克松推行他的新的战略，首先是争取从印度支那脱身。印支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剧了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而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美国无力挽救南越、老挝的亲美政权。

正当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日趋衰落之际，苏联却乘机楔入这一地区。1968年6月，苏联第一次派遣海军进入印度洋，并建立一支太平洋分舰队。1969年，勃列日涅夫抛出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宣称：“这个体系是现有军事政治集团的更替”，“是事态发展的需要”。显然，其目的是企图以“亚安体系”来更替已经瓦解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而由苏联取代美国在东南亚及整个亚洲的霸权地位。

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东盟甚为焦虑，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五国外长于1971年11月在吉隆坡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了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提出的“东南亚中立化”的建议。11月27日，会议通过了《东南亚中立化宣言》，即《吉隆坡宣言》，宣言表示，五国决心共同努力，“争取使东南亚作为一个不受外部强国任何形式或方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得到承认和尊重。”<sup>⑥</sup>中立化宣言和1972年东盟第二次高级官员会议对和平、自由、中立区的说明，表明东盟五国决心建立一个区域内部合作，不受外国干涉和影响的东南亚<sup>⑦</sup>。

在建立中立区的方针指导下，东盟国家对苏联的扩张采取谨慎态度。1973年6月16日，东盟第六次部长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坚决拒绝参加“亚安体系”。当苏联自称“亚安体系”是实现东南亚中立化的“可靠保证”时，东盟一些领导人明确指出，苏联推销“亚安体系”的目的，是“想取代美国的势力，成为亚洲的盟主”。1974年，印度尼西亚外长马立克便说，“亚安体系”是建立在“政治霸权”的基础上的，是想保证一个超级大国在亚洲的地位。

总的说来，东盟在第一阶段具体的合作进程是比较缓慢的。从1967—1975年，东盟共提出过1343项建议，执行的238项，仅占总数的17%<sup>⑧</sup>。这个时期合作的重点是政治方面的。P. M. 雷詹德兰在评价东盟规定的经济目标时说，这不过是涂在“东南亚联盟这块饼”上的“糖衣”<sup>⑨</sup>。的确，东盟国家的地区贸易量依然处于低水平，1975年，整个东盟的地区贸易总额为66亿美元，仅占东盟贸易总额的15%。<sup>⑩</sup>

尽管如此，东盟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还是有了良好的开端。这主要是寻求在国际贸易中采

取一致的立场，以对付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损害东盟国家的利益。例如，1973年，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天然橡胶生产国(如斯里兰卡)共同建立国际缓冲囤胶组织，以对付帝国主义的压价；1975年，东盟五国成立了石油理事会，处理东盟地区的石油消费问题，以共同抵制帝国主义在石油工业方面的种种垄断；1974年，成立了东盟海运常设委员会，以减少对外国控制的远东航运公会的依赖，并在1975年成功地迫使远东航运会修改提高运费的计划，由原议增加运费26%降低到18%；东盟在这方面的联合斗争，确曾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抵制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垄断，捍卫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利益。

1976年，东盟发展进入第二阶段。

1975年下半年以后，印度支那地区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印度支那人民经过长期的抗美援朝，赢得了和平和独立。1975年5月1日，越南全部解放，接着于7月2日实现了南北统一。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解放军占领金边，成立了民主柬埔寨。老挝也在1975年12月2日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人民共和国。

东盟国家的领导人担心：印支人民的胜利，会对他们国内产生政治影响，使反政府武装运动抬头。尤使他们忧虑不安的是：越南胜利后，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此时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已露端倪，抗美援朝结束后数万越军拒不撤出战争期间占用的部分柬埔寨领土，而且苏越加紧勾结，1975年10月，黎笋访问莫斯科，苏越签署了《联合宣言》和《联合声明》，确定两国在党、政、军、财、文等各方面全面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东盟感到它的安全和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此外，西方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使出口导向型的东盟经济受到冲击。面对苏、越的扩张和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东盟各国觉得急需加强成员国之间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合作。

1976年2月，东盟五国在巴厘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sup>①</sup>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sup>②</sup>，发表了联合公报。条约和宣言强调：各成员国在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民族特征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各国应对本国和本地区的发展计划采取联合行动，充分利用各成员国的资源，互相补充，以加强经济合作；各成员国要以“共同的态度和行动同地区性经济集团和个别经济大国打交道”，在“改革国际贸易制度，改革国际货币制度”方面，“采取联合态度”。此外，还表示“各成员国决心消除颠覆活动对它的稳定造成的威胁”。但是，在安全问题上，东盟成员国是在“非东盟的基础上”进行双边合作。

第一次首脑会议之后，东盟各国加快了经济合作的步伐。1977年2月，东盟五国外长在马尼拉签署了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协定<sup>③</sup>。这是东盟加强经济合作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特惠贸易安排协定规定：除诸如大米和原油这类基本商品以及东盟五项工业项目的产品，应享受优惠待遇外，在东盟各国招标的各项国际投标项目中，给予成员国以低于非东盟竞争者2.5%的优惠差额，但最多不得超过四万美元<sup>④</sup>。3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决定在大米与原油发生危机时，优先照顾成员国的大米和原油需要，并同意成立一个专家小组研究设立东盟五项工业建设项目的可行性<sup>⑤</sup>。

1977年8月，东盟五国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这次会议上，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宣布放弃对马来西亚沙巴地区的领土要求，马来西亚则保证不再支持菲律宾南部反政府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两次首脑会议之后，东盟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获得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横亘在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渐渐得以消除。在第二次首脑会议后，马科斯总统夫妇访问沙巴，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菲律宾政府和人民都认为沙巴是马来西亚领土的一部分，从而圆满地解决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多年来不断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沙巴主权之争。

其他成员国之间也采取了措施来消除分歧，解决争端。因为根据《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缔约国有责任“克制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在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出现争端时，高级理事会（由缔约国各派一名部长级代表组成）有权向有关各方建议采取诸如斡旋、调停、调查和调解等解决争端的办法，并在争议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可进行斡旋和组织调整、调查或调解”<sup>⑧</sup>。这样减少和防止了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

其次，东盟五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977年，在一次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各国一致同意达成的关税减让共计71项，减让率为10—30%<sup>⑨</sup>。此后特惠商品项目逐步扩大增多，1982年1月已增至8,529种，进口关税的优惠率后来又改为20—25%。此外在金融、财政方面采取了相应的合作措施，相继成立汇划结算同盟和银行票据承兑市场，为区域内的贸易提供方便。

东盟已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实体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活动。东盟国家同日本、美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日美为东盟的第一、二位贸易伙伴。尤其是日本在东盟的外贸和外援中均居首位。1983年，东盟与日美的贸易额分别占东盟贸易总额的22%和16%<sup>⑩</sup>。

东盟也努力发展同欧洲共同体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友好经济合作。1976年，东盟五国首脑和澳、新两国总理分别会晤，澳、新两国为东盟区域工业合作提供3.6亿美元，援助双方并就减少关税壁垒达成协议。1979年11月，欧洲共同体十国和东盟五国的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部长级会议，讨论双方发展贸易和合作问题，会上，双方外长重申了“在平等、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合作范围的共同愿望。”1980年3月，双方又在吉隆坡举行会议，欧洲共同体给予东盟以普遍优惠制，使东盟国家获得更多的商品输出机会。欧洲共同体与东盟的贸易联系加强，到1983年，它已成为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美，其贸易额占东盟贸易总额11%<sup>⑪</sup>。

东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同第三世界国家一道，积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支持“印度洋和平区”的建议，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支持阿富汗人民反对苏联的入侵。

1979年12月25日，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下侵入柬埔寨，占领了柬埔寨的主要城镇与交通要道，陈兵柬、泰边境，多次对泰国进行武装挑衅，严重威胁东盟国家，特别是泰国的安全。为了增强对抗越南的实力，防范越军的侵略，东盟国家不仅普遍增加军费，扩充军事力量，而且在外交上展开支持民主柬埔寨的正义斗争，谴责越南侵略，强烈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在几届联合国大会上，东盟国家始终坚持正义立场，要求柬埔寨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支持民主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拒绝承认柬埔寨伪政权。东盟国家的这一正义主张，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热烈支持，也得到美、日、西欧各国的支持。因此，接连五届联合国大会均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保持民主柬埔寨合法席位，要求越南军队立即全部撤出柬埔寨，让柬埔寨人民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1980年6日，部分侵柬越军入侵泰国，被泰国军队击退。东盟立即就这一事件作出强烈反应，东盟举行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越南的侵略行动对泰国和东南亚地区构成严重的、直接的威胁，表示坚决支持泰国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

\*

\*

\*

今日东盟已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治、经济集团。它的国际声望日益提高，也增强了它维护本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能力。今后，东盟的发展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但是，东盟也面临着许多现实和潜伏的矛盾和困难。

一、东盟的政治、经济地位，使它在东南亚占有重要的位置。东盟国家的领土面积约30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东南亚总面积的四分之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尤其是马六甲海峡扼印度洋和太平洋海上交通的咽喉，是重要的国际海洋通道。东盟国家自然资源富饶，物产丰富。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的石油，马来西亚的橡胶、木材、棕油，菲律宾的糖、铜、椰子，泰国的米，锡等行销世界。东盟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在世界市场的主要原料供应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1975年本地区天然橡胶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82.9%，棕榈油的出口占世界总额83.6%，锡占72.8%，椰子产品占75.5%<sup>②</sup>。此外，还出口相当数量的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丰富资源的东盟国家，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必将继续成为美、苏超级大国争夺的对象。因此，对东盟国家来说，坚持反霸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一斗争的成效，直接关系着东盟国家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同时，美苏在这一地区的争夺是同他们在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争夺密切相关的，因此，东盟国家的反霸斗争也不是孤立的，善于在不同范围，不同形式上的联合反霸，乃是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独立的有效保障。

二、东盟在经济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许多困难。它们的经济对外依赖性较大。如1983年，东盟与美、日、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49%<sup>③</sup>。由于它们着重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国投资减少，出口需求下降时，它们的经济倒退也在所难免。

扩大经济合作的范围，寻求更多、更稳定的市场、是保证东盟国家的经济继续以较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还比较缓慢，东盟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仅是初具规模，相对说来进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1983年，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还只占它整个贸易额的21%<sup>④</sup>。扩大东盟国家之经济合作，是保证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此外，这些国家，除新加坡外，初级产品在生产和出口中占很大比重。这一格局直到80年代尚未改变，结果适逢80年代世界市场上的初级产品供过于求，价格大跌、贸易条件恶化，其弱点便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下，其经济增长也在80年代上半期突然减速。因此，如何根据变化着的形势调整国家的经济产品结构，使其经济脱离初级出口产品的工业化道路，谋求稳定发展是东盟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东盟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在社会、经济、民族及宗教等方面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困难。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将使东盟这个区域性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